

黄炎培与穆藕初

——近代企业界与教育界携手奋斗之典范

陈正书

本世纪的前四十年间，在上海乃至中国，一个教育家与一个企业家之间，相濡相挈之友情，能达到“四十年交好，到老犹新”的，^①恐怕无出于黄炎培与穆藕初之右者。从1901年他们相识，到1943年穆藕初辞世，历四十三年。他俩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奋斗，却又时时携手，相互支撑。一个声名显赫的企业家与一个著名教育家之间如此深沉的友谊，从一种具体的、独特的角度反映了近代中国（上海）企业界与教育界之间的紧密关系。

黄炎培与穆藕初之间，深沉友谊的基础是什么？总体上说，爱国、救国、振兴中华这一共同的理想是他们之间友谊的坚实基础。然而，众所周知，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人的共同理想。因此，仅仅以此来说明他俩之间的友谊基础恐怕就过于简单化了。我们从黄炎培和穆藕初身上看到有不少共同的品位和气质，故而认为同气相求在他俩深沉友谊发展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俩有哪些共同的品位、气质？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他俩在事业上又是如何走上了不同发展方向？穆藕初对于黄炎培从事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对于职业教育给予了不少资助。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他俩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经济赐予与被赐予么？他俩之间的友谊有什么样的时代意义？研究并基本上搞清这些问题，不仅对于黄炎培、穆藕初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很有价值，而且，必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同气相求

基本类同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俩青少年时代已形成基本类同的品位和气质。

黄炎培与穆藕初是同乡。他们都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厅（即以后的上海市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滚滚黄浦水和江边冲积平原的沃土养育了他们。他俩的家乡川沙，紧挨着正在形成中的，远东最大的经济、文化、信息中心，繁华的大上海。这就是他俩青少年时代所共处的大环境。^②

黄炎培生于1878年，穆藕初比他长两岁。他俩都经历了一段“家道中落”的青少年时代。

黄炎培的父亲黄叔才是个豪侠之士，以秀才出身在私塾教书多年，以后浪迹天涯，先后在河南、广东、湖南充督抚吴大澂等人的幕僚。平生好打不平，却又“挥金如土”，因此，黄炎培13岁丧母、16岁丧父以后就艰于生计了。他只得长期寄居外祖父家，虽然外祖父十分富裕，也相当疼爱他，然而，在那个时代，仍难免有寄人篱下之苦衷。为了尽可能少地依赖于外祖父，他每逢暑假、年假就到川沙县城叔父所开的小商店打零工，直到二十岁还没有说定亲事，只因为他是个没有任何遗产可继承的“穷小子”。^③穆藕初的父亲早年在浦西十六浦开办了一家“穆公正花行”，从事棉花贸易，因此，他的童年生活还是十分富裕，然而，1884年前后，他父亲在竞争中破产，不数年而“床头金尽”。于是，他14岁就失了学，不得不到另一家花行去当学徒。17岁父亲亡故，他与胞兄穆相瑶以庶出之故，非但无遗产可继承，还被迫挑起赡养老母的担子。^④家道之中落，迫使他俩早早地踏上社会，早早地领略了世态的炎凉，早早地看到了社会下层的种种苦难。

^① 《追悼穆藕初先生·黄炎培氏挽联》，见《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

^② 参阅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穆藕初《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③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第28页。

^④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4页。

中国传统社会里，凡超群出众的人物，其素养、气质、品位养成的背景之中，往往都有一位贤淑善良的母亲。他俩儿提时代都从这样的母亲那里，接受了爱的教育、同情弱者的教育，尊重女性的教育以及克己、奉献的教育。^①对于他俩形成相类的品位、气质是又一重要的具有共性的源头。而这种品位、气质的投合往往成为他俩互为奥援的原动力。

在他俩的少年时代，中国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黄炎培的外祖父孟荫余，指点他观看“‘谅山战役’泥板画”，他从中看到“法国兵开火……满纸烟焰”，幼小的心灵中已经涌动着对于“外国侵略中国”的愤懑。^②穆藕初于甲午年间闻讯“我国大败，接受城下之盟”时，“心中之痛苦，大有难以言语形容者”。^③深重的国难，在他们年轻的心灵中都埋下了振兴、自强、反抗列强侵略的爱国思想种子。这是数代人共同的心结，也是他俩将自己与整个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共同的纽结点。

童年时代类同的生活环境，类同的境遇和早期教育，不仅缔结了他俩都具有刻苦、坚韧、奋发、积极进取、尊重女性、以天下为己任等可贵的品位、气质，而且，在处世方式以至思维方式上都塑造了类同的模式。这就构成了他俩易于相互理解的基础。总之，“同气相求”是他俩“四十年交好，到老犹新”的根由。

二、中西兼学，学以致用

同气相求是人们在交往中建立友谊的重要基础，然而，在人们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友谊的巩固、发展，往往还受到他们对于某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是否具有共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之间，对于如何看待中西学问的关系问题上是否投契，往往成了他们能否相濡相携的条件。黄炎培与穆藕初成长的时代、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俩治学取“中西兼学”之道。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已经成为西学传播的中心。确实已经有一批卓越的知识分子，逐步了解了声光化电、泰西风土人情、以至代数、几何、天文、地理等新学识，已经介入了新学的传播，甚至已经在酝酿以西方的社会、政治模式，进行维新改良。然而，在当时的上海（不仅指华界，也应考虑租界）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终究处于什么地位？在社会生活中的内应力强度处于怎样的状态？依然存在着的科举制度，在人们特别是在一般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看一下黄炎培、穆藕初的父辈为他俩的教育所作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黄炎培出身在一个相当典型的、传统的书香门第。不仅他的父辈叔伯都是秀才出身，而且，在他父亲去世以后，收养他的外祖父孟荫余是一个拒绝应考却“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的读书人，他自设“东野书堂”为乡里办学；黄炎培的舅公沈树镛举人出身，官至内阁中书，是苏松地区著名的藏书家，并有“收藏金石甲于江南”之誉；沈树镛之子沈肖韵系黄炎培的姑丈，也是在外祖父去世后黄炎培唯一的监护人。沈肖韵以贡生入仕，甲午以后归里继承父业继续广收天下名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这样一个书卷气的氛围中，长辈们是如何安排他的学业的呢？从6岁（1884年）开始，黄炎培的母亲就着手教他识字，接着就由他的叔父教他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了，从9岁（1887年）开始到外祖父家的“东野草堂”（在川沙东乡的一个环境幽雅的私塾），比较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所读的是《易》、《书》、《诗》、《春秋左传》和《礼记》，历十年之久。1899年以府考第一名中秀才，1902年中举，因而黄炎培有相当的国学底子。^④

穆藕初出身于一个小商人家庭，然而，他的父亲在“事业正盛”之际，一如我国传统时代的许多商人，他们仍期望儿孙能登科场，以“显亲扬名”。所以，不仅他的胞兄穆相瑶自

^① 参阅：黄炎培《八十年来》、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

^②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③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6页。

^④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第29页。

幼入塾学习传统诗书，直至1903年中举人；而且，在穆藕初六岁（1882年）时也送入了私塾“受课”，只是由于家道中落，才不得不让十四岁（1889年）的穆藕初辍学。八年之中他也读了“四书、诗经、礼记、古文观止”，虽说只是达到了“诗习两韵，文仅起讲”的程度，^①然而，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之中。

黄炎培跟穆藕初接受传统文化的时代，毕竟是在旧中国被迫开放近半个世纪以后了，西学之东渐已经走过了数十年漫长的道路，与封闭时代大不一样了，对于青年学子而言，在“中体西用”的旗帜下接受西学已经相当盛行。^②这是当时的时代特征。

他俩所处的客观的大环境，决定了他俩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必然广泛地接触来自西方的物质文明。

他俩家乡一江之隔的大上海，日日夜夜轰鸣着粼粼车马、隆隆机声，和着江面上呜呜轮船飘过江来；随着舢板、轮渡，华夏各地南腔北调，英法德日各种语言，送来了列强步步进逼中华的铁蹄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呼号声，世界各地新发明、新技术、新文化、新宗教等等奇闻异说。临江而望，江面上驰骋着插着万国旗子的大小轮船，对江沿岸建筑起成排的洋房，开辟了花园，飞驰着快马，上海这一近代世界的大舞台上，不时登临着的上至各国元首、将军、中外银行家、商人、中外教士、律师、记者，下至各国的流氓以至上海的青红帮、地痞、乞丐、咸水妹，连同各色新奇的商品。总之，大上海这鱼龙混杂、混混沌沌的新奇世界，远不是区区一条黄浦江所能隔绝的。凡是二十世纪初世界上能听到、能看到的任何东西，他俩（浦东人）都能听到、看到。

他俩少年时代生活的小环境更具备引导他俩接触西方物质文明的条件。

黄炎培的父亲可以算作跻身于当时的维新行列的人物。他父亲、外祖父去世以后，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从小看重我、喜爱我、培育我”，这就是他的姐夫，著名的藏书家、川沙近代化毛巾生产的创始人沈肖韵。他的这位监护人更是理所当然地属于上海地区的著名维新人物。

穆藕初的父亲原本就是商人，棉花又是当时上海中外贸易中主要商品之一。更加以在相当长的贸易生涯中，穆氏家族与当年上海最著名的商人郁屏翰、朱志尧等家族关系十分密切。^③

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于童年时代的黄炎培、穆藕初接触新奇的西方物质文明带来了相当有利的条件。他俩在少年时代，首先是从各色商品中认识西方文化的。童年时父亲买来的玩具、稍长后在叔父商店里接触的，由“上海进货”的种种洋杂货，这些来自广州、上海的商品，以及他在姑父沈毓庆开办的毛巾工场、漂染工场见到的近代化的生产，无不成了黄炎培接受新学（西学）的媒介。从川沙到上海的货船上接触的各路商贩，以及他们与厘卡酷吏的周旋活动，特别是他在叔父商店里站柜台的生活，无不是他耳濡目染商业文明的课堂；^④穆藕初13岁就进入花行参与棉花贸易，下至苏松各地收购棉花、春茧，平日里冷眼旁观花行内种种交易手段，以至于直接为“洋商包办收茧”，特别是他在外籍教习勃朗家，边“帮教”边学英文近一年，^⑤耳濡目染之西方物质文明更甚于黄炎培。小小的商品、平凡的交易，乃至与洋杂处，令他俩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尽管还都是些感性认识，对于他俩日后系统地接受新学（西学）却是十分有益的先导。

很凑巧，黄炎培与穆藕初最初接触西学，都是从自学赫胥黎的《天演论》开始的。1895年前后，17岁的黄炎培在他的姑父家得以博览群书。他所读的《天演论》就是沈毓庆送给他的第一部书。他看了以后有何感受？在《八十年来》一书中没有明确地谈。然而，从以后

^①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3页。

^②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5页。

^③ 参阅《穆太夫人五十寿辰纪念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本。

^④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第22—23页、第26—27页。

^⑤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4—9页、第10页。

他在阐发教育思想,论证教育的职能、教育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时熟练地引用《天演论》的内容,特别是1938年,他在60岁时所写的《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一文中,说:“悟世界之日在进化与其进化之由来。观万物在天演界因优胜而生存因劣败而灭亡之可幸与可悲,而觉悟而认识我人应有之努力。”相当明确地反映了《天演论》对于青少年时代的黄炎培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之影响是如何之深。^①

穆藕初25岁(1901年)考入江海关工作后,有机会在江海关图书馆博览群书,他自己认为27岁(1903年)那一年是他“吸收新知识最得力之一年”,因为这一年他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从中感悟出“淘汰的可畏,争存之必要”。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他在“自强不息中”不断地“锻炼出新吾来”。^②

他俩接触西学都以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入门,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几乎可以说整整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从这一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书”^③的《天演论》开始入门的。入门终究只是入门,以后比较系统地学习西学的途径就因人而异了。他俩原先所处的生活圈子、社会环境总还有一定的差异,又由于他俩系统学习西学的机遇、模式不一,不仅形成了他俩治学途径的差异,也导致了他俩在事业发展上的不同方向。(他俩学习途径上的差异,大体可以分两个阶段考察。鉴于他俩具体学习日程穿插不一,不便于以具体的年份区划,这里仅作前、后期之区划)

黄炎培在父母亡故以后,境遇虽然不佳,然而,作为他的监护人,先是他的外祖父孟荫余,孟荫余去世后是他的姑丈沈肖韵,他们不仅十分富裕,而且都是具有维新意识的文人。因此,他们还是为他创造了比较好的求学环境。特别是在维新思想十分强烈的沈肖韵的安排、资助下,黄炎培于23岁(1901年)考上了南洋公学。从此他得以在正规学校的条件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文化学习”。黄炎培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④

跟黄炎培相比,穆藕初开始接受新文化教育的道路要曲折并艰难得多。他从13岁失学以后,被迫踏上了商业社会,从14岁当棉花行学徒开始,历尽艰辛,不得不一边劳作一边自学。甲午战争以后,尽管他有“求西学之决心”,却没有条件进入诸如广方言馆、南洋公学之类正规学校,只能边工作,边上夜馆念书。1901年(25岁)考入江海关工作以后稍有好转,但是,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仍只能“於晚间从西人处读书”。^⑤

黄炎培学习的内容与途径,可以说是学习前辈中国著名学者咀嚼以后的、比较系统的、具有中国色彩的西学,有相当高的学术性,理论性。他在南洋公学的学习生活中,至关重要是获得了蔡元培的教诲,虽然为时仅仅一年,却受益非浅,不仅比较系统地上英文、日文、中文、算学、哲学、政治、经济等课程,而且,在蔡元培等良师带领下,参加了演说锻炼,以至在蔡元培先生的启迪、指导下走上了将毕生奉献给振兴中国教育事业的道路。更重要的是由于蔡元培在教育上不仅具有“兼容并包”的特色,而且相当讲求实效,因此,培养了黄炎培在教与学的模式上具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良好倾向。^⑥

穆藕初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直接在与西方人接触的过程中向西方入学西学的特殊道路。他最初是吃住在英国人勃朗家里,一边打工(“帮教”)一边学习英语。进入江海关以后,所依靠的一是江海关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二是在江海关西人所办的夜校听课,“研习历史、算术等”;三是在具体的海关业务处置过程中,从外籍关员处学习具体的几乎完全西式的关务,即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转中学习具体的西学。尽管学术味较淡,就西学而言却较近乎“原汁原汤”。对于来华的西方人、西方经济活动的内里,有较多的感性认识。同时,他还追随

^① 《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页等;第3卷,第377页。

^②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4—9页、第10页。

^③ 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3页。

^④ 《八十年来》,第31页。

^⑤ 参阅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4—14页。

^⑥ 参阅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四十年前在校求学之所得》等。

上海社会上的维新人士，通过沪学会以及由它演化出来的演讲会、阅书报社、体育会、新剧社、组织职工投身抵制美货运动等等社会活动的实践中学习。由于穆藕初学习新学过程更多地与社会、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他在海关组织抵制美国迫害华工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组织才能受到张謇等著名人士的赏识，被张謇保举为苏路警察长，使他有条件走南闯北，期间考察了各地社会经济，看到了国家、人民的贫困。所有这些因素合作一起，就导致他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定在实业救国的方位上。^①

在他俩以后学习西学的旅程中则出现了大致相反的情况。

黄炎培从1902年末南洋公学被迫解散，1903年初遵照蔡元培先生的嘱咐，投身于办学事业以后，毕其一生始终都处于办学校、主教政、投身革命运动三者交叉推进的生涯之中。因此，1903年以后，他学西学是以出国游历、访问、考察、调查的形式实现的。他在这一方面的主要经历有：

1903年6月—12月，流亡日本，初到神户得侨商陈平斋昌号业主，全力资助免费食宿，后到东京寓东樱馆，与革命党人刘三相过从。

1915年4月—7月，以游美实业团编辑报告人身份游历美国，注重考察美国教育。

1917年，先后专程考察日本、菲律宾和英、荷两属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职业教育。

1918年4月 再次访问印尼。

1921年 访问泰国（暹罗）。

1923年 访问越南，考察越南华人教育。

1929—1931年三次访问朝鲜，考察朝鲜的教育状况。

综合黄炎培出国访问、考察的活动，可以看到这一阶段他的学西学，具有紧密联系实际，深入调查、考察，择善而从，学以致用等特点。具体地说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1. 目的明确，专业性强。历次访问、考察，包括被迫流亡之际，都以研究西方，以及西方列强在殖民地的教育活动以及教育行政状况为主题。

2. 带着问题，比较研究。在同一时期他对国人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足迹所到除了京、津、沪以外，遍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山东、福建、广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从中发现并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他出国考察期间，总是带着这些问题，就英、美、日等国家的教育方式、方法、教育行政的组织等等，作深入的考察并进行比较研究。

3. 择善而从，学以致用。他在大量、深入调查、考察的基础上，在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作出科学的分析、提炼上下过极大的功夫。联系国内各地考察、调查所取得的实际资料，总结吸收有益经验，撰写了大批专论，为改善、推进国内职业教育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方针、计划。^②

黄炎培在《我师蔡子民先生之生平》一文中说：“当炎培等受学时”，蔡元培先生“所以朝夕昭示”者，“一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基点”，同时，“未尝以此自域，尝训吾侪后生……多吸收世界知识”。^③从中不难看到，他对于“中学”、“西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蔡元培的思想。

与黄炎培不同，穆藕初在后期之求西学，集中于1909—1913年留学美国之时。他先后就读于惠尔拨沙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伊立诺大学和得克萨斯理工学院，先攻读农科专业，后攻读棉纺及制皂专业，以农学硕士学成归国。

从他四年留学生活来看，大体上与黄炎培有着共同的特点，即注重于紧密联系实际，深

^① 参阅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4—14页。

^② 参阅《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至4卷；《八十年来》第73—77页。

^③ 参阅《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第61页。

入调查、考察，择善而从，学以致用。具体地说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1. 确定目标，紧扣专业。穆藕初出国之初鉴于在国内南北考察所见，认为我国国力之所以贫弱，根源在于农村破败、农业落后。因此，确定专攻农学，力求学成归国致力于推进农业发展。然而，在1912年前后，他看到国内军阀混战，动荡不宁，即使有科学的农业生产技术及组织管理水平，归国以后亦难以建设农场，更难以在一般农村推行，理想与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于是确定以农产品加工业作为进一步攻读的对象，以国内棉产最为重要，棉纺织品及肥皂在国内市场最为广阔，所以选择了棉纺业、制皂业作为专攻对象。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农学硕士而归国。

2. 深入调查，注重比较。他在美国学习期间，利用寒暑假到农场、工厂打工，同时注意考察调查，不仅限于生产技术，更注意于生产组织与管理。访问对象上至农场主、厂长，下至农业工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专程登门向国际上科学管理之鼻祖泰勒及其弟子吉尔培求教。十分可贵的是，他一边学习一边将生产、管理中各个环节作了中美之间差异的详细比较，作出十分客观详尽的研究报告。

3. 择善而从，学以致用。他在美国期间，除了正规上课以外，还就美国学校生活、社会生活等多方面作了考察，相当实际地就美国社会中的一些优点，如：扬善抑恶、青少年的独立精神、学生自治能力、注重体育等等加以吸收；而对于老无所养则持批判态度。他将美国社会生产中的一系列有效的方式，带到国内，率先翻译出版了泰勒的《科学管理法》一书，特别是将工厂管理模式应用于他创办的德大纱厂、厚生纱厂及郑州的豫丰纱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果说以上三点与黄炎培之学习西学有共同的特征，那么穆藕初又另有一个特点则是黄炎培所难以具备的。那就是积极参与西方人的生活。他不仅参与了学生的一切活动，而且参与了农业劳动，工厂生产，以至获得了更多第一性的知识。这是由留学与访问考察这两种不同的形式所决定的。^①

我们从黄炎培与穆藕初学习西学的经历及态度上又可以进一步体验到他俩共同的品位与气质，也进一步向我们预示了何以他俩在以后的合作中如此默契。

三、携手奋斗，振兴中华

1904—1909年间，黄炎培与穆藕初刚开始踏上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旅程，各自正开始自己的事业。然而，他俩之间已经有过一段携手奋斗的经历。

1904年黄炎培刚从日本流亡归国，住在南市竹行弄杨士照家，致力于创办城东女学。穆藕初则恰好由镇江关回到上海，一边在江海关工作，一边在夜馆学习英语，也住在南市。他俩“朝夕过从”，“相与话食贫况味”交换人生感受，同时讨论读了《天演论》等书籍后的体会。1905年，黄炎培在着手创办浦东中学的同时，已经在蔡元培的介绍、推荐之下参加了同盟会，并且担任了同盟会上海干事，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他还与沈恩孚、袁希涛等发起成立了“江苏学务总会”（即江苏教育会的前身），担任调查干事。穆藕初在江海关则被选举为海关总会华职员董事，自发地出来组织江海关与邮电华人职员，举行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华工的集会。工作之余他俩又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如何才能推进我国“人才辈出”、如何实现“国家昌明”的理想。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斗争、共同的认识促使他俩携手发起并积极地参与了沪学会的读书活动、体育操练、民族音乐演奏、爱国演讲活动。

期间，由于在海关带头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华工，穆藕初遭到美籍副税务司的忌恨而被迫辞职。但是，他并未面临失业的威胁，而是立即受到龙门师范学校的聘请，出任英语教习兼学监。这件事办得如此迅速、顺当，尽管到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资料，然而，根据当时他俩关

^① 参阅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5—51页。

系之密切，根据黄炎培当时在上海教育界的地位，我认为与黄炎培的帮助有关。这一段早期的相濡相携共同奋斗的生活，大致一直延续到1909年穆藕初赴美留学。^①这一段共同奋斗的历程中，最值得我们的注意的是，他俩在振兴中华与教育培养人才的关系，以及培养教育人才必须从修养、常识、体魄等多方面同时着手等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共识。如：黄炎培刚从日本流亡回上海，就着手兴办城东女学、丽泽学院、浦东中学，穆藕初在沪学会活动中，同样在“兼办义务小学”；黄炎培在这些学校中，不仅讲“文学”而且“特重武术”；穆藕初在办学及沪学会活动中，同样既重视“增进……知识”的“名流演说”，又“力倡武学”，专门组织“体育会”。^②这些共识的形成就为以后他俩在更高层次上携手奋斗奠定了基础。

1917年对于黄炎培与穆藕初携手奋斗是最为重要的一年。

黄炎培在经历了三年之久的实用主义教育基础上，总结了经验，明确提出了必须将实用主义教育进一步推进到职业教育。为了筹办职业教育，他于1917年1月访日，专程考察日本的职业教育。同月，起草发表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宣言、组织大纲、募金通启。这一年2月和5月又分别去菲律宾和英、荷两属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考察职业教育。撰写了《日本分设职业教育》等专论。

穆藕初在1914年成功地创办了德大纱厂以后，由于他切实而又比较系统地在工厂管理上下了功夫，德大的棉纱在北京商品陈列会上获得全国第一的殊荣，迅速在全国打开销路，不仅在社会上取得了相当高的声誉，也筹集了相当可观的资金，对于支持黄炎培开创职业教育既有相当的号召力，也有了一定的实力。

在穆藕初等一批实业家的支持下，终于在1917年6月15日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穆藕初等12人被选举为该社的议事员。7月29日又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议事员会，黄炎培出任办事部主任。同日，上海创办了第一所职业学校和第一所商业补习学校。穆藕初都为之捐资并被选为校董。以后还长年给予资助。据当时在职校任职的潘文安先生回忆，穆藕初有“校董中最热心之一人”的美誉。穆藕初在一次支付捐助支票后对他说：“如果费用有困难，仍可来商于余，余希望君等体任公创办之苦心，无使精神受物质之影响而稍有减色。”^③

从现象上看，黄炎培与穆藕初之携手奋斗拓展事业，最主要的也就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中华职业学校的创办和维系其发展一事。然而，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不能仅仅从现象去认识他俩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以下两方面的问题是必须作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的。

1. 黄炎培与穆藕初在实业与教育两方面的携手奋斗，是一代（甚至几代）实业家与教育家携手奋斗之缩影。中华职业教育社及中华职业学校，则是近现代中国实业家与教育家携手奋斗的一大璀璨的成果。

一方面，黄炎培在从事教育救国的活动中，与实业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取得了广泛的支持。最早给他以全力支持的川沙近代建筑业先驱杨斯盛。以后，在流亡日本时，又受到旅日侨商陈平斋的全力资助；而中华职业教育社及中华职业学校的资助者，除了穆藕初还有陈嘉庚、聂云台、徐静仁、穆相瑶、刘柏生以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等一大批实业家。^④另一方面，穆藕初之支持教育也不仅是支持黄炎培所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他还以巨额捐款赞助一批出洋留学生，捐资创办位育小学、位育中学等等。^⑤所有这些都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黄炎培与穆藕初在实业与教育两方面的携手奋斗，反映了近代中国的一代，乃至几代具有远见卓识的实业家，教育家，为了富国、强国、救国而携手奋斗的伟大精神。

2. 黄炎培所开创的职业教育是他与当时一批实业家，特别是与穆藕初在教育思想、教

^① 《藕初五卜自述》，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黄序》第11—12页。

^② 《八十年来》第43页；《藕初五十自述》，第11页。

^③ 穆藕初的长子穆伯华（已故）收藏的原稿复印件。

^④ 参阅《八十年来》第71—72页；《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第22—26页、32—123页。

^⑤ 参阅《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上卷第1—11页，第16—18页。

育理论上共同探求的丰硕成果。

诚如黄炎培先生在《中国教育史要》一书中所说，在近代中国，从第一代创办近代实业的洋务派曾、胡、左、李开始，凡是要想或实际已经在创办实业（且不讨论资本性质）者，都必然要同时提出或实际去创办学校。如：早期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路矿学堂、电报学堂等等。以后，又有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蚕桑学堂、时务学堂；再往后又有南通师范学校乃至普遍地开办的各种大、中、小学校。^①他们几乎都是当时的实业家与教育家携手合作的产物。问题在于，在办学的目的、办学的方式、教学的内容、以至对于教师及学生的要求等等，与教育理论相关的问题上，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发展水准。从这一意义上讲，黄炎培与穆藕初之携手奋斗又有其特殊的贡献。

对于近代中国教育史、教育思想、理论发展史，笔者没有作过系统的研究。因此，这里仅作个案的分析。仅以黄炎培与穆藕初关于职业教育问题的观点作比较，以探求他俩在职业教育产生、发展中携手奋斗之内涵，或可有所裨益。

1914—1917年间，他俩各自根据自己的考察、研究，在教育与实业的关系问题发表了一些论著，对于职业教育的产生在理论上作了准备。

黄炎培在1913年开始，先后发表了《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考察本国教育笔记》等文章，揭示了当时我国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状况，提出要真正振兴教育，就必须将教育与各地的实际结合，改变目前形式上讲“实用教育”，实际上却往往“仍不能解决学习者实际能力教育”，使之能有效地为我国经济、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必须使中小学教育与生活实际、生产实际结合起来。他从1913年开始就探索中小学中推行实用主义教育，由国光书局出版《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1914年3月他拒绝与张勋合作，辞江苏省教育司长职（1912年出任），以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身份，在《申报》、商务印书馆资助下赴安徽、江西、浙江、山东、河北、陕西考察教育，并发表了一系列地方教育状况的考察报告。为在全国发展教育，特别是为实用主义教育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②黄炎培先生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他非常注意将理论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进而推进教育理论的发展。他在《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一年》中还非常自信地讲：“实用主义，不可谓无突飞之进步……盖其趋势出于自然，匪可强而遏之，亦无庸握而长之……吾将指岁星以稽其成绩焉”。然而，到了《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二年》，他通过在各地的调查，发现“有一种现象，足使吾人非常注意者。”那就是“假斯主义为涂附面目”而实际上却不尽人意。同时，他经过在美国的考察发现“观美国教育……凡所设施，无一非实用，”然而，他们认为“世安有不实无用，而尚得谓教育耶”，“故以实用主义四字语，彼国教育家未免失笑”。因此，1915年他就对实用主义教育产生了怀疑，提出：“盖实用二字，决无所变，惟主义二字有所未安耳”。继而到了《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三年》即1916年，他概略地指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一‘社会生计之恐慌’，二‘百业之不改’，三‘各种学校毕业生失业之无算’”。他认为上述社会问题的存在，说明仅仅看到“教育之不实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更应该看到“职业教育之缺乏”与上述社会问题关系更为密切。他赞赏这样的一种观点：“知识上之实用，与直接谋生之能力”，应当说是有所区别的。他又及时地总结了全国教育界发展的趋势，表扬了南通师范学校设农工科；江苏第一师范设实习农场；江苏第二师范设商业科；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中学自第三年起，视地方情形，酌授职业教科；江苏教育会1916年8月召开年会一致通过组织职业教育研究会、小学教育研究会决议：“以手工为职业教育之中心，重应用的手工，顾及经济，务切实用。”断然地宣言“将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三年，谓是职业教育萌生之第一年，可也。”^③

黄炎培教育理论从实用主义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化，与实业界，特别是与著名实业家穆

^① 《黄炎培教育文集》第3卷，第55页。

^② 参阅《八十年来》第65—66页。

^③ 《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第148—151页；第182—184页；第320—322页。

藕初有无关系呢？显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穆藕初由美国学成归国恰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以后的近十年间，正值中国民族工商业得以抬头，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就上海而言，更是工业发展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恰在1914年穆藕初创办了第一家纺织厂，德大纱厂只是一家资本仅二十万两，纱锭不足一万的小厂。然而，以他对美国、日本乃至国际纺织业的广泛了解，在《日本纺织托赖斯之大计划》一文中，已经看到了国际托辣斯化的必然趋势，提出了中国纺织业要能在世界上站住脚跟，也必须“厚集经济势力”，办大厂“以利竞争”。经多方努力终于集资百万，开始筹建拥有近十万纱锭的厚生纱厂。基于此，他对于所需的劳动力，所需之各种人才深感紧迫；同时，他在《论国民不当纯抱悲观》、《在体育场之演说辞》等文章中，揭示了军阀混战状态下社会之黑暗、混乱，教育之破败，大声疾呼振兴教育培养人才。

与之同时，穆藕初以他在美国考察所得，以及他在创办德大、厚生纱厂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对于实业发展需要解决的“民德、民智、民力”的问题，在《游美国塔夫脱农场记》等文章中指出，美国塔夫脱农场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重视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特别强调将教育与具体的职业结合起来。他在《在体育场之演说辞》、《在引翔乡太平寺内之宣讲辞》等文中，还针对当时军阀混战对中国社会破坏的严重状况，对于教育的职能提出要求：既要培养高尚的社会公德，培养强健的体魄，也要培养技术、技能。^①

在发表上述文章的同时，穆藕初更是身体力行，在创办德大纱厂以后，他立即在厂里开办工人夜校，除了识字、书写等文化知识以外，特别亲自将国外进口机器的各种零件、性能、使用说明等翻译成通俗的语言文字，亲自在夜校向工人讲授。为职业教育开了先例并创造了一定的经验。^②

穆藕初上述言论与行动，既反映了当时实业界对于人才的需求，对于发展教育的需求，也反映了实业界对于教育形式、内容、方法等方面的观点。从黄炎培与穆藕初日常密切的往来，可以断言，这些要求与观点对于黄炎培教育思想从实用主义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随着上海职业教育的发展，关于职业以及职业教育的内涵、目的、组织方式、教育实施方案等等，有一个从实践到理论逐步完善的过程。期间，黄炎培与穆藕初都有一系列的论述，我们不妨作一些对照。

关于什么是职业？

黄炎培所下的定义：职业就是“用劳力或劳心换取生活需求的日常工作”，是“一种确定的互助行为”，是“对己谋生，对群服务”。^③

穆藕初所下的定义：“夫职业之解释有二：一就人事上言之：凡社会中人，各出其本能，以就多方面谋生之途，统谓之职业。如：农人之务力田；工人之务劳作；商人之务贸易等皆是。一就天良上言之：世界上无论何种微细事业，业之者皆得提起其精神，发挥其能力，扩大自家之责任增高所业之地位。此盖不以泛泛之职司视之，而确认自己对于所事有绝大天职二字。即孟子所谓‘古之人修其天爵’者是。”^④

关于什么是职业教育？

黄炎培所下的定义：职业教育就是：依据人们分担的“日常工作”的需要“启发人的智能”，“给人以互助行为的素养”，“使人人广其知而大其爱”，“了解我与群的关系”，在“对群服务”中“换取生活需求”。^⑤

穆藕初从教育内容与实施方式的特点上提出的看法：

^① 《藕初文录》第7—13页。

^② 《藕初五十自述》第51页；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第662页。

^③ 《黄炎培教育文集》《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纲要》等文，集中摘引自第1卷。序言，第4—5页。

^④ 《藕初文录》第7—13页；第92—97页。

^⑤ 《黄炎培教育文集》《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纲要》等文，集中摘引自第1卷，序言，第4—5页。

职业教育的内容包含着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

1. “教导诸生，能制出诸种物件”。
2. 培养学生“精密思考……与人角胜于市场”之能力。

这里又包含着三个具体的内容：

[1]思考“如何使出品精美……合用户心理”

[2]思考“如何不浪掷工作时间”

[3]思考“如何可以不耗费各种原料”

3. 培养学生“耐劳习惯，持久性质，克己复礼工夫”；“斩除一切巧取幸获之观念”——“立身处世之大道理”。

职业教育的教学途径：讲堂教授、“讲堂以外至广至繁之地方，在在皆为育之事业活动之范围”；“西谚：‘世界为大学校’不其然欤”。^①

关于兴办职业教育的目的与指导思想：

黄炎培认为是：沟通教育与职业来改革教育脱离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弊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培养和提高学生多方面的素质。成为“社会国家的健全良好分子”。

“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②

穆藕初认为是：为了振兴“凡百农工商矿各业”实现“实业救时之主张”，必须“助长周备……有学堂以启迪愚蒙”，所以办好职业教育是必备条件之一。“农夫固陋，中外皆然，宜利导之”要改良棉种就必须办“农校”培养具有“植棉知识”之“专门人才”。

培养纺织“专门人才”是“振兴棉业”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棉业不振的”原因之一，在于纺织厂既“无专门人才督察之，管理之”；又因“缺乏专门技术”和“训练”，“工资虽廉”，但是“工作不精良”，往往只能“含混过去”，因此，工厂的“出数少，出品劣”在“竞争剧烈”的市场上难以“留残喘之余地”。任何人都不应该“常迁转在事业场里，随意变动。视其身如旅客，对职守如传舍，不负其应负之责任，不尽其当尽之心力。”因而，职业教育不应该“无专业”。^③

另外，他还认为办好职业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

从上述对照中，我们不难看出，黄炎培与穆藕初对于职业教育的一系列观点是何其相似。同样明显的是穆藕初的一系列演说、报告，与实业家所接触的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联系相当紧密，在提法上则相对通俗化、感性化。黄炎培的一系列观点则具有相当的条理性和理论高度。另外，我们还必须强调，在上述理论指导下，黄炎培还化费了毕生精力，多次设计，不断调整职业教育的具体实施方案，始终如一地深入各地推进职业教育的具体执行。当然，这是实业家不必要，也不可能执行的业务。

总之，黄炎培与穆藕初之间携手合作开拓的职业教育事业，有效地推动了实业发展。这是近代上海一代教育家与实业家相互携手，以教育的发展推动实业发展的一代典范。这一事例启示了我们，实业家与教育家之间的关系，远不是单纯的经济资助与被资助的关系，二者是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实业家的作用，不仅在于经济上的资助，更重要的是根据实业发展的预见性，提出对于教育事业的需求，并在教育思想、模式、对人才的客观要求等方面提出要求，以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又必须依靠教育家从教育理论上加以提高，携手奋斗，将适应于时代需要的新型教育模式，加以实施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发展。

本文发表在《史林》1997年第二期
(作者系历史所研究员)

^① 《藕初文录》第7—13页；第92—97页。

^② 《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纲要》等，集中摘自《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序言，第6页。

^③ 《藕初文录》第5页；第93页。